

# 不是工人国家，也非资产阶级国家？

1938年2月

列·托洛茨基

## 政治形式与社会内涵

不久前，又有同志（B.和K.）对苏联的阶级性质提出质疑。在我看来，他们的答案大错特错。由于两位同志没拿尖叫扯头发代替科学分析（某些极左分子的强项），再度讨论这一重大话题还算合理。

二同志没有忽略苏联与现代有产国家的主要区别：自身生产力的强大（跃进），并承认「十月革命奠定的经济结构基本未变」，由此得出结论：保卫苏联击退帝国主义侵犯，是苏联及世界无产者的责任。上述框架内，我们与质疑者拥有充分共识。尽管框架很重要，它并未涵盖所有的争议话题。虽与极左派拉开距离，二同志仍断言「从（工人国家）这一名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（？）意义上说」，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。既然「经济结构基本未变」，苏联又不是有产国家；执政官僚层——按照二同志的可喜判断——也非独立阶级，那么苏联到底为何物？客观地说，上述脱节错乱立场的综合，恰好呼应了莫斯科的最新文宣——苏联已不是阶级社会的国家组织。它到底是什么？

对国家性质的阶级理论，二同志发起了新一轮修正尝试。我们并非油盐不浸的终结主义者。假设新的有力史实要求突破旧思想，没人会裹足不前。但已知的诸多「理论创新」至少教会了我们一件事：保持谨慎。我们将深思熟虑地比较旧理论与新现象，而非急于开宗立派。

二同志不经意地提到一个事实：鉴于主客观条件的无比复杂，无产阶级的统治「可能体现为千差万别的政府体制」。为了清晰起见，笔者作点补充：这一阶级统治既体现为苏维埃的自由党争，也体现为一党独裁，甚至体现为独夫的绝对权力。对苏维埃制度而言，个人独裁无疑是紧迫至极的危险信号；但某些时候，它是拯救制度本身的唯一手段。换句话说，国家的阶级性质不由自身的政治形式来决定，而由社会内涵——财产形式与生产关系的特征——来决定。国家的功能，在于保护具体的关系与形式。

泛泛地说，二同志不否认上述观点。但为何不承认苏联是工人国家？他们摆出两个原因：一曰经济原因，二曰政治原因。「近半年」——他们写道：「莫斯科彻底走上毁坏国有计划经济的不归路」（仅仅「走上了不归路」）。接下来，二同志指出局势的演变「迫使官僚层与国民经济的客观需求正面对抗，这一对抗日益高涨及深化」（仅仅在「迫使」）。最后，二同志总结道：官僚层与国民经济的矛盾并非始于今日，但最近一年「当权集团对经济计划（的实施）积极怠工，并摧毁着国有垄断」（仅仅「摧毁着」？亦即尚未毁灭？）。

第二个原因带有政治特征：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，首先不是经济范畴，而更多地属于政治范畴.....如今，无产者阶级统治的所有形式、机构和创举均遭摧毁，亦即无产阶级统治的毁灭」。二同志刚宣布无产阶级制度具有「各种形式」，却又抛出这么一段话，让我吃惊不小。诚然，无产阶级专政——不仅「更多地」、而彻头彻尾地——属于「政治范畴」。但政治无外是集中的经济。德国社民党一度控制国家机器并领导工人士兵代表会（1918-1919年间），却与无产阶级专政毫不相干：它们始终维护了「神圣不可侵犯」的老板财产。相反，假设一种政治制度使国有财产——剥夺有产阶级的结果——免遭帝国主义毒手，无论它有怎样的政治形式，均等同无产阶级专政。

质疑者「一般来说」似乎也承认这一定义。他们的对策，是综合运用经济与政治论据。他们说：官僚不仅消灭了无产者的政治权力，更把经济撵进死胡同。若干年里，官僚虽有反动性，仍扮演过相对的进步角色；最近，它彻底蜕变为反动因素。这一论断确含健康内核，它完全符合第四国际的评价和预测。「开明绝对主义」[1]曾扮演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进步角色，却不妨碍自己演变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；众所周知，绊脚石与进步的冲突以革命告终。第四国际认为官僚的「开明专断」也能充当「打基础」的进步角色，尽管时间远较历史先例为短。这一观点已得到生活的证实。忘乎所以的官僚狂热追逐更高增长，并跌入经济危机的深渊；危机的爆发，反过来成为当权者慌张情绪与屠刀政策的一大主因。莫非，苏联的生产力跃进已告终结？不必急着下定论。尽管存在官僚专断的牵制因素，国有经济的宏大创造性仍足以推动生产力前进多年（尽管速度或许较低）。目前无法确切预测具体的过程，但有一点很明白：对执政集团来说，眼前的政治危机比生产力停滞的远景危险十倍。

退一步说，暂且假定官僚已是经济提升的绝对阻碍。然而，这一（假定）事实是否意味着苏联的阶级性质已变？抑或苏联已丧失任何阶级性质？我觉得两位同志的主要错误正在于此。

直至大战前，资产阶级社会一路高歌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。仅仅最近二十年，资产阶级才成为进步的绝对阻碍。那么，能说当今社会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吗？不能，这无非证明了它的腐朽。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被迫依靠法西斯暴政，以保全自身产业；换句话说，有产者丧失了直接统治的一切形式及方法。那么，能说现存国家不再是有产国家吗？不能。法西斯主义的全部野蛮只有一个目标：保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，亦即法西斯国家仍是资产阶级国家。

我们无意给上述历史对比蒙上绝对意义的神圣面纱。但它毕竟讲了一条道理：官僚垄断权力乃至生产力的停滞，尚未自动更换社会及所属国家的阶级性质。谁能改变这一性质？只有一种手段——革命或反革命暴力对财产关系的干涉。

有人问：有没有国家与经济的阶级对立先例？有！第三等级建立政权后，数年内法国社会仍带有封建性质；苏维埃国家诞生的最初数月，工人政权统治了资本主义经济。在农业领域，苏俄的工人专政多年依靠小有产者经济（相当程度上，现在也是如此）。假如资产阶级反革命获胜，复辟当局将被迫暂时依靠国有经济。类似的对立意味着什么？它意味着革命或反革命，它意味着一个阶级战胜另一阶级并固守自己的胜利，它意味着胜利者将从自身利益出发重组经济体系。「政经分裂」是各种社会转折的必经时刻，它与极左派杜撰的另一理论——「无阶级国家」的理论（由于没有真正主人，伙计即官僚占据了剥削者的位置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。

1938年2月

《反对派日志》N62-63

1译者注：国内通译为「开明专制」，似不确。